

# 试论郑观应培植国力的外交思想

罗红希

**摘要:**郑观应不是职业外交家,而是作为洋务实业活动家和维新改革思想家闻名于世。他贯通中西,一直参与洋务和与外人打交道的实践活动,这就孕育了他日后培植国力的外交思想,他在这方面的许多理论和主张,对近代中国外交的起步和形成发挥过重要作用。

**关键词:**郑观应;培植国力;外交思想

**中图分类号:**F123.16 **文献标识码:**A

**文章编号:**CN43-1027/F(2011)01-134-02

**作者:**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;湖南;长沙,410000

外交与内政的关系是辩证的,双向的,一方面,外交是内政的延伸,外交服务于内政,另一方面,内政决定外交,是外交的基础。郑观应对此有深刻的认识,希望中国的内政仿照西方加以改革。相互影响,不仅内政影响外交,外交反过来也影响内政,在郑观应的心目中,内政对外交的影响是巨大的。他认为,一个制度健全、秩序稳定、经济繁荣和实力鼎盛的国家,才有可能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。他认识到,要实现国家的外交目标,必须发展国力,为外交活动奠定政治、经济、交通、军事等方面的基础。郑观应早年深受洋务思想的影响,投身洋务事业,在办理洋务事业的过程中,进一步加深了对外交内政关系的认识,形成了“外交与内政隐相维系”的识见,这些内容主要有:介绍和引进西方的议院制度;振兴民族工商业;为发展电报事业作出贡献;关心国防的建设等等。

(一)主张“师夷长技”,介绍和引进西方的议院制度。

郑观应通过多年的社会实践,“主以中学(君主),辅以西学(立宪)”,他十分了解清政府的专制统治的弊端,所以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,并与封建专制统治阶级进行思想上的斗争,打击清政府的君主专制政体。同时在国难当头的时候,他极力呼吁自强救国。因此其改良主义思想具有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,反映了当时广大爱

国人民的要求,但郑观应的思想也存在着对封建统治的依赖、对帝国主义的幻想。郑观应是洋务派,主张“师夷长技”,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,但他并不主张全盘学习西方国家的“民主”、“自由”,“然博采旁参,美国议院则民权过重,因其本民主也。法国议院不免叫嚣之风,其人习气使然。斟酌损益,始终经久者,则莫如英、德两国议院之制”。他不主张完全抛弃君主,而实行民主制,认为民主政体施政方略变易太多,选举总统竞争过于激烈,于国不利。他赞成像英国一样保留君主,实行君民共主的议政制,即稍后提出的君主立宪制。“泰西有君主之国,有民主之国,有君民共主之国。君主者权操于上,议院不得擅施行,弊在独断,德、俄等国是也。民主者权落于下,议院得以专威服,弊在无君,美、法等国是也。英为君民共主之国,君可民否,君不得擅行;民可君否,民不得擅作,立法独为美备。然上情可以下逮,下情可以上达则一也。”可见,郑观应仍然主张保留君主,所以“君民共主之国”是郑观应宪政观的目标。郑观应宪政思想中的议会观是强调“人治”,而不是“法治”在分析“中国不能自强,由于上下离心”时,郑观应说:“惜守旧者恶谈西法,维新者不知纲领。而政府志在敷衍,惮于改革,不求中外利病是非,只直安富尊荣,保其禄位。行政之人尤安于苟且,无论如何善政,由朝廷下督抚,以一纸告示城乡,略加新名饰耳目,此外寂无举动矣。”形成这种“安于苟且”、“上下离心”的渊源,是国家政治机器的运转失灵,人才奇缺。设议院是为“用奇兵以制胜”,是不得已的权衡之计,“无论议院设与不设,急宜仿西法,广开大小学校以育人才”。所以,重要的不是议院形式,而是“通言路,举人材。”关键在于权力再分配、君权限制,而在于改变官场积习。郑观应反复强调:国之盛衰系乎人材,人材之贤否视乎选举。选举之法是力克保举之弊的最佳选择,“盖议院为集众以求一当之地,非繁群器以成一哄之场,必民皆智慧,而后所举之员乃贤;议员贤,而后议论措置乃得有真是非,否则,徒

滋乱萌,所谓,欲知其利,当知其弊。”这就是郑观应的“议会观”的实质内容。

郑观应通过多年的社会实践,对中国贫穷、落后的根源和对君主专制的弊端有着比较清楚的认识,又通过对西方政治制度和法律文化的学习,介绍和引进西方的议院制度。虽然是封建官僚,不能彻底摆脱他的阶级局限性,但他清楚,只有先进的政治制度,才能维护政治的稳定,才有可能为国家外交提供坚强的后盾。

(二)提倡“商战”,振兴民族工商业。

郑观应深知,一个国家的外交必须用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,他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,并提出通过办洋务、创办民用企业等途径,增强国力,为中国外交奠定坚实的基础。鉴于此,郑观应不仅仅停留于口头的倡导,而总是脚踏实地、躬亲体行。

郑观应经营了60多年近代工商交通企业,长期任买办,一生是商人,他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对我侵略的方式和手段,概括为军事侵略即“兵战”与经济侵略即“商战”,并加以对比分析,认为后者比前者有更大的危害性和隐蔽性。他写道“泰西各国,以商富国,以兵卫国,不独以兵为战,且以商为战。”他力主用经济战来对抗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,极力主张仿效西方在国家扶持下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。认为这既是国家富强之道,又是外交的必要。郑观应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提高到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,充分体现了他以国家实力为基础的外交思想。

郑观应认为外交治本的根本途径,外交的成败归根结底是由商战决定。即由经济实力的强弱来决定。因此他主张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与外国资本主义在市场上进行斗争,以维护自身的利权。这就需要发展近代工商业,郑观应认为:近代工商业发展了,不仅国家致富,军队能有自造的新式装备,更能在市场上与外国的廉价商品相竞争。要达到真正的富强,就必须在经济上战胜帝国主义。他说:“兵之并吞祸人易觉,商之培克敝国无形。我之商务一日不兴,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。纵令猛将

如云,舟车林立,而彼族谈笑而来,鼓舞而去,称心膺欲,孰得而谁何之哉!”因而郑观应将“商战”视为实现其“攘外自强”救国谋略的基点。他认为,在当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威胁下,中国要“登于富强之境”,拯救民族危亡,只有振兴民族工商业,他把工商业看作是国民经济的枢纽和主要推动力。为此,他明确提出“以商立国”的主张,因为“商贾具生财之大道,而握四民之纲领”。他同时又认为,商战要有强大的工业为后盾,即“有工以翼商”,因为要使商业有价廉物美的商品,首先必须有先进的工业为其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。因此,他早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,就提出要设专厂制造民用机器,主张发展民族机器制造业。攘外为了使中国民族工商业获得有力发展,以便有效地进行商战,郑观应主张要限制和取消外国侵略者在华的各种特权,强烈要求清政府实行“保商之良国”和革除“困商之弊端”,包括给予专利权、实行商品注册条例、举办商品竞赛会、鼓励组织公司、裁撤厘卡、减轻其他捐税负担等。他提出“欲攘外”,必须自强;欲自强,必先致富;欲致富,必首在振工商;欲振工商,必先讲求学校,尊重道德,改良政治。变法为了实现“以商立国”的主张,郑观应提出,要学习西方,进行改革。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,要引进先进设备,要“人尽其才,地尽其利,物畅其流”,还要开办自己的银行,以解决生产和流通中的矛盾,促进商品和资本加快周转,因此,“银行行为百业总枢纽”。为了把工厂、矿务、交通运输、银行办好,还要有新式管理和技术人才,所以要办学校,培养人才。为了“以商立国”,郑观应认为,要改变“官办商督”的办法,因为“官办商督”有官夺商权、管理不善、浪费严重、效益低下、受制于上、不能维护华商利益的弊端,所以他一再揭露封建官僚在官办商督企业中“官夺商权”、“专擅其事”、“调剂私人”和贪污中饱等行径,主张新办新式企业应“一体主张民间开设,无所禁止”。郑观应始终认为,只有商业和民族企业强大了,外交才有可靠的保障。

(三)为发展电报事业作出贡献。

郑观应敏锐地觉察到,通讯事业对国家外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。早在19世纪70年代,郑观应便著文介绍了电报的功用,并指出电报事业关系国家“强富之功

基”。主张中国应立即兴办电报,在与外人打交道过程中,逐渐增多了他对西方各国的了解。不论在他前期的著作中还是在后来,他都对中国电报事业的发展给予了很大关注。他指出“轮船、火车、电报宜兴也,不兴则彼速我迟”把兴办电报提高到与兴办轮船、火车同等重要之地位。他进一步阐述了电报是国家“强富之功基”的原因:“夫世之至神至速。倏去倏来者,盖莫如电。藉电以传信,则其捷也可知。无论隔山阻海,顷刻通者,诚启古今未有之奇,泄造化莫名之秘”。正因电报如此迅捷,若能兴办将对国家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。郑观应指出,由于中国“国家版图式廓,幅员之广,冠绝亚洲,各省距京师远则数千里,近亦数百里,合沿海、沿边诸属国、属部、属藩,周围约四五万里,鞭长莫及,文报稽延”,所以电报能使中央政府及时了解和掌握各地之动态。从而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。其次,电报在军事上用途极大。“诚以两国构衅,赖电报以传递军机,则有者多胜,而无者多败。”他举例道,“昔年普法构兵,普人于行军之处俱设电线。而法人所设之电线悉为普人所毁。是以法败而普胜也。”故在战场上“一迟一速之间,即胜负所由决矣”。鉴于此,郑观应指出,用电报可以及时传递市场信息。“商贾贸易,藉电报以通达市价,则无者常绌,而有者常赢。”所以,当时中国商人要与在华外商竞争,用电报即时传递信息是非常重要的。最后,郑观应认为,兴办电报不仅可以便利官民,还可以增加国家税收,于国计民生都有益。他举英国为例,“其电报设于王家,商民欲通电报者收回工费。每年所入,除电线局开销,余货籍充国用。至本国有军机密事,分文不费。其利岂不溥哉?”面对有人以“经费过巨,恐不易筹”,阻拦兴办电报,郑观应指出“若中国毅然举行,推广其用,更与商民传信,酌费照收,则一、二年必能填还创设款项。嗣后所入源源不绝,利贻无穷,诚益国便民之要务也。”为此,郑观应大声呼吁,“夫轮船、枪炮等物,中国用之有年,损益犹为参半,至电报则有益无损矣。何不举而试之哉!”反映了他希望中国能立即创办电报的迫切心情。

由此可见,郑观应非常推崇电报事业,并把其介绍到中国来,并直接参与设计。电报事业的启动,间接的缩短了国际国内的距离,提高了信息的速度,大大加快了国

际信息的交流,对外交产生了间接的影响。

(四)关心国防的建设。

虽然郑观应十分强调商战对外交的重要,但绝对不否认国防建设对外交具有中流砥柱的作用,如前面所提到的商战、设电报等实质上就折射出与外交的某种联系。此外,郑观应还多次提出:“今夫保民之道,莫先于强兵;强兵之道,莫先于富国。”“言富国者必继以强兵,则练兵、铸械、添船、增垒无一非耗费巨款巧妇宁能为无米之炊?”“非富不能图强,非强不能保富,富与强实相维系也。”“我国欲安内攘外,亟宜练兵将、制船炮,备有形之战以治标;讲求泰西士、农、工、商之学,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。”由以上论断不难看出:郑观应将国防建设和商战作为国家自强的治标治本之法。商战为国防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,没有这个基础,国防建设难以实施;没有强大的国防,商战亦不能获得施行的外部环境。可见,国防建设同外交是相互促进、互为条件、缺一不可的,它们共同构成了让中国外交走向成功的基本条件。郑观应的国防思想是魏源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观点的继承和发展。他之所以提出加强国防建设,其目的在于:“不亟讲求兵备,力图自强,即欲求为贫弱而不可得,又安望能洗丧师之耻,复失地之仇哉。”但他却不孤立地谈国防建设,而是把国防建设同外交联系起来,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救时救国方策,为近代中国的外交做出了极大的贡献。

从以上四个方面可以看出,郑观应并不主张孤立地看待外交,而是把外交与国力联系起来。他为发展国家政治、经济、交通、军事实力提供了一系列的建议措施,有些具有非常的可操作性。这些主张都是为了一个目标,就是提升国家实力,为外交奠定了坚固的基础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夏东元:《郑观应集》,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1982年。
- [2] 夏东元:《郑观应集》(上),上海:人民出版社,1982年。
- [3] 夏东元:《郑观应集》(上),上海:人民出版社,1982年。

本文是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2010年度院级课题(社科方向)的阶段性成果之一。课题编号为:2010Y27。

(责任编辑:柳玉华)